

我在台湾宣传鲁迅

□陈漱渝

从1989年8月至2008年10月,在这20年间,我曾经前后6次到台湾,而这6次都以学术交流为主要目的。还需要补充说明的,除2008年我最后一次到台湾发表的是有关林语堂的论文之外,其余5次都以宣传鲁迅为主要内容。我所说的“宣传”,是“说明”“讲解”的意思,“传播”、“传扬”的意思。

我到台湾宣传鲁迅有三个优势:一,我长期以鲁迅研究为职业;二,我在台湾有亲友,来去比一般大陆民众方便;三,此前我对台湾的鲁迅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因此在台湾宣传鲁迅针对性比较强。早在1987年鲁迅诞生100周年之际,我就在台北作过题为《港台鲁迅研究状况》的学术报告。1982年7月,我又在中国鲁迅研究会在烟台举办的鲁迅讲习班作过同样内容的报告。这篇讲稿后来收进了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作《鲁迅史实求真录》。

值得庆幸的是,1989年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就随身携带了一部《鲁迅语录》(5卷本)的书稿。内容是:一,谈文论艺;二,创作自述;三,人物评估;四,华夏剖析;五,人生品味。很快,这部语录就由台湾天元出版社出版了。天元出版社当时还挂了另外两块牌子:李敖出版社、孩子王出版社。天元出版社主动要求出版这套《鲁迅语录》,是希望跟他们此前出版的《李敖语录》配套。他们认为,鲁迅和李敖都是社会批判者,是都市丛林中勇敢无畏的斗士。考虑到市场销路,这部《鲁迅语录》只印出了4个分册,但仍按5个分册结清稿酬。1991年,我又在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青少年鲁迅读本》,作为《中国现代作家读本》丛书的第一部。这本书的篇目由我选定,导读文字多由我的大学同窗好友杜学忠教授撰写。在台湾解严初期,这4个分册的《鲁迅语录》和一本《青少年鲁迅读本》,对于普及鲁迅多少总会发挥一点作用吧。

我在台湾宣传鲁迅,主要对象是大学生。从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令”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一度对引进或介绍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品表现出

较大的热情。3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几乎同时在台湾推出即为一例。台湾的很多高校也定期安排学术讲座,内容包括介绍“五四”新文学。通过朋友辗转推荐,我几乎在台湾所有高校都发表过关于鲁迅的讲演,如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台南师范大学、台东师范大学、中正大学、空中大学、东吴大学……我还在东吴大学讲授过关于左联的课程。我无法判断这些讲座取得了什么实际效果,但能感受到的是每次现场气氛都比较好。除了去高校,我还在台湾一些县市的社教馆、文化馆、中学乃至社区沙龙宣讲过鲁迅,听众包括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对我的宣讲都颇感兴趣。

最正规的学术交流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进行的。时间记不清了,但讲演稿一字不易地刊登在1990年文哲所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第3卷第1期。那时文哲所长叫戴维璋,台湾师大毕业生,是许世瑛教授的弟子。许世瑛是鲁迅挚友许寿裳的长子,而鲁迅又是许世瑛的开蒙老师,所以戴所长称鲁迅为“太老师”。根据我涉猎的资料,台湾对鲁迅有一种流行看法,即认为鲁迅在大陆一直被神化;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都采取了粗暴的否定态度;鲁迅的杂文都是骂人的文章,算不上是文学;鲁迅1927年之后左倾是因为领袖欲旺盛,令人痛惜。针对这些看法,我有选择性地讲了4个问题:一,关于神化鲁迅和贬损鲁迅;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国民性的解剖;三,鲁迅杂文究竟算不算文学?四,鲁迅为什么会向左倾?我认为我的讲话虽然不得如何深刻,但完全是学理性的;台湾学者对我的讲话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1991年是鲁迅诞生110周年,我在台湾《中国论坛》第31卷第8期发表了一篇《明暗的堤防——鲁迅著作在台湾》,也被一些台湾和日本的研究者引用。

(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我与鲁迅的相遇

□蔡登山

民党的死敌,毛泽东力捧之人,是绝对不能阅读他的著作的,否则您的思想就绝对有问题,是要坐牢的。台湾作家陈映真就是被搜出家中有鲁迅著作及马克思著作而入狱的。但我及几位朋友为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到估岭街旧书摊、新生南路台湾大学附近,偷偷买到这些作家的香港“盗印本”,“雪夜读禁书”,别是一番滋味。所以我很早就读到鲁迅的著作(包括改名为周树人的《中国小说史略》及改名为本社编辑部的《古小说钩沉》),及曹聚仁写的《鲁迅传》等著作。

我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鲁迅是无法回避的人物,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永远是个存在。于是百年以来,人们歌颂他、诋毁他、研究他,终其目的,无不在找寻鲁迅的真正形象。为此我两度拍摄《鲁迅》的纪录片,一次是1994年作为《作家身影》系列之一,我拍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另一次是2004年作为《大师身影》系列之一,我拍的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在这两部视角不同的纪录片中,凡是传主居住过的地方,作品故事发生地,文献记载的行迹处所,皆为镜头捕捉猎取的对象。另外相关的国内、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传主的亲友、门生、故旧;甚至改编传主作品的导演,我们都尽可能地访问到,一方面为传主留下历史见证,一方面也为作品或思想提出多元的解读。

曾有人写过《鲁迅骂过的人》一书,但早在曹聚仁为鲁迅作传时就说过:“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也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是的,鲁迅“骂人”有时极为刻薄,有时还“骂”错人,但那是鲁迅的一个面向。其实鲁迅亦如常人,他也有温和动人的一面,为此我写了一本《鲁迅爱过的人》,这“爱过”是指广义的,包括爱情、亲情、友情及师生之情,甚至奉母命成婚的“无爱”之情。我试图去探索鲁迅内心温柔的一面,在他峻急之外的另一面,他也有大爱如渊的一面。

从“偷读”鲁迅的作品,到拍摄鲁迅的纪录片,再到写有关鲁迅的书,我仿佛看到“约莫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明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着破鞋”的“过客”,向我迎面走来……

(作者为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副总编辑,文史作家)

我最近参加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鲁迅研讨会,谈到许寿裳1946年至1948年间在台湾宣传传播鲁迅的情况。许寿裳与鲁迅的交情,正如他说的:“我和鲁迅生平有35年的友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东京订交的时候,便有缟带纻衣之情,从此互相关怀,不异于骨肉。”许寿裳又说:“鲁迅之丧,我在北平,不能像汉朝范式的素车白马,不远千里地奔张劭之丧,一直迟到寒假,才得回南,至上海万国公墓中鲁迅墓地,献花圈以申‘生刍一束’之忱,归途成了一首《哭鲁迅墓》,诗如下:‘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正因如此,许寿裳应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陈仪之邀于1946年6月25日抵达台北,并接掌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至1948年2月18日深夜,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6号住宅遇害。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他极力地宣扬鲁迅,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后又结集成《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发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仅如此,每当有人邀请许寿裳去做演讲时,他便必谈鲁迅精神,“仿佛是为了介绍鲁迅先生而到台湾去似的”;而当人家劝他删去《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直斥国民党当局的段落时,他又大义凛然地拒绝:“如果删去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灵魂。”

当我们看到1904年邵文容、许寿裳、陈仪、鲁迅4人摄于日本东京的照片,就可知他们4人相识即早,更有同乡之谊,交情决非泛泛。而后来陈仪因“二二八”事件被调回大陆,编译馆骤然撤废,此一举动有着背后的政策意涵,国民党要翦除鲁迅的影响势力,已昭然若揭了。许寿裳从此再也无法得到陈仪的保护了,也因此原本极力宣扬鲁迅思想、精神的许寿裳,在此际只写了两篇有关鲁迅的文章。而诸如李何林及许寿裳的女儿许世伟,都将许寿裳的死,指向国民党的政治暗杀。许寿裳死后不久,鲁迅等人的作品,更成为禁书,当然再也没有见到曾经宣扬鲁迅,而为知己者死的如许寿裳的人了。

余生也晚,1972年上大学时,我的老师许世瑛是许寿裳的儿子,他教我们“中国文法”的课,但到我毕业我都不知道他是许寿裳的儿子,因为那时台湾是“戒严”时期,不仅不能提及许寿裳、鲁迅等人,连沈从文、巴金、老舍、曹禺等人都不能提,他们因为没来台湾,都被视为“附匪”作家,他们的作品也禁止阅读。我当时上“现代文学”课,整个学期只讲徐志摩、朱自清、郁达夫几个人,因为他们早在1949年之前就去世了,没有“左派”、“右派”之分。而鲁迅虽也早在1936年就去世,但他是国

笔者以研究方向故,对人物一直特感兴趣。多年收藏、影印、笔记的数据中,也以人物传记最为全面丰富。《鲁迅日记》中的人物注释部分,长久以来我即特别关注,并且发现其中有些人物的学历部分不足或有误。有些人物特别是籍贯为台湾或香港,或是1949年前后移居港台的大陆人士,因资料不易掌握,常注明“未详”。此外,学历上最普遍的错误,大多来自师范学校,以许广平就读的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为例,五四前的“女子师范”,系预科一年,本科四年的五年制初级师校,入学资格为小学毕业生;其后升级为“高等师范”,系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的四年制,收旧制中学(四年制)或初級师校(五年制)的毕业生;其后再升级为“师范大学”时,除收新制(三、三制)的高中毕业生外,原高师毕业生如再加修二年课程,也可取得大学毕业证书。再以许广平本人为例,她系1917年9月至1922年6月的五年制天津直隶(今河北)第一女师毕业生;1922年9月考入四年制北京女高师国文系,于1926年6月毕业。毕业时,学校已由高师改制为师大,但她仍是改制前的旧制高师生,因此正式学历应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高师部国文系毕业生,而非女师大国文系毕业生。许广平的高师同学如马云、陆秀珍(晶清)等均在加修二年学分后,始成为“女师大”国文系毕业生。女师大一直到1929年才有第一届毕业生。

《鲁迅日记》中的人物注释,系集合全中国大陆的鲁迅专家研究者,经多年的辛勤努力与分工合作,才有今日的成果。注释者或为知名的作家,或为杰出的评论家、学者,但少有专注的史料学家或如钦鸿似的笔名学家。人物注释最重要的,系要辨别本名、谱名或学名、化名,是以字、号、笔名、别署等,当然生卒年及籍贯、学历、经历,是一定要字的。但中国人一般习以字、号尊称对方,或成名后常以字、号或笔名。有的注释者不注意及此,就会出现姓名与字号颠倒事。五四前后,因时局

《鲁迅日记》中人物注释的补正与辨识

□秦贤次

动荡,加上学制、校名常在更改,如学校本身的升级或合并,或教育部的规定,由专门改称专科,由大学改称学院,预科的存废,初级师校一度合并入中等学校等不一而足,加上校友录的稀见,要正确的叙述注释人物之学历(包括校名及科系等),实际上有一定的困难度。

笔者是一位狂热的爱书人,也是长期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加上研究兴趣所在,曾搜购非常多一般藏书家、学者,甚至图书馆均较为忽略的中国(包括少数日本)各著名大中学校的毕业纪念册、校友录(除单册外,有时常会出现在某一年的毕业纪念册中)、学校一览等工具书。在约40年前,也曾经花上几年工夫,利用休息日或干脆请假到台北木栅“教育部档案室”抄录及影印各著名大学知名学生的学籍资料。笔者也同在40年前,曾编有《民国作家笔名录》,其在台北《新知杂志》双月刊上连载。这是我大胆敢写这篇论文的最大原因及背景。

因此,笔者不揣简陋,根据2006年12月的新版《鲁迅全

集》,凭借手上数据,对其日记中的人物注释加以补正或辨识,思对鲁迅研究能有一丝一缕的贡献。

一、曰据时期(1923—1945):从“文学家鲁迅”到“左翼鲁迅”

1923年,许乃昌在《台湾民报》发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首次向台湾文坛提起了鲁迅这个名字,此后又有张我军、蔡孝乾等将鲁迅作为新文学的重要作家进行介绍。鲁迅作品及译作成为台湾新文学初创期白话文的典范和文学创作的模仿对象,赖和、张我军、杨守愚等人的创作都受到鲁迅的影响。通过对鲁迅作品的转载及张我军、张秀哲、张深切等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与鲁迅的接触,台湾接收了鲁迅同情“弱小民族”的思想讯息,鼓舞了他们的反殖民文化活动。

1928年到1945年间,台湾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接收鲁迅的讯息、阅读鲁迅的作品。1930年以后,山上正义、日高清磨等和增田涉等人相继在台湾发表文章介绍左翼鲁迅的形象,直接促成叶荣钟等台湾知识分子对鲁迅观的转变。台湾左翼作家也与鲁迅弟子胡风、萧军等发生精神联系。如1935年,胡风将杨逵的《送报夫》译成中文在大陆发表,并送给鲁迅阅读;1937年6月,杨逵在日本获得萧军的《第三代》,阅读后深受感动,表明台湾知识分子与鲁迅的思想、精神联系进一步加深。通过黄得时、王诗琅发表于1936年鲁迅逝世时的文章和龙瑛宗发表于“皇民化”运动之后的文章可以看出,台湾文坛已经从前期只关注鲁迅的小说转向对鲁迅更具思想与战斗性的杂文的关注,对鲁迅的认知也从“文学家”而进入更深层次的“思想家”的层面。鲁迅也因此成为台湾知识分子反殖民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并为光复初期台湾爆发的“鲁迅风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光复初期(1945—1949):鲁迅“战斗精神”的更迭演进

1945年,早年在大陆与鲁迅有过间接交往的林金波就表示希望在台湾发扬鲁迅的精神。从1946年开始,大批大陆左翼文化人来到台湾,与台湾文化人共同掀起了纪念和学习鲁迅的高潮,形成台湾现代文化史上罕见的“鲁迅风潮”。这一时期,鲁迅“战斗精神”成为两岸左翼知识分子共同对抗黑暗现实、反抗国民党官僚统治的思想武器。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为传播祖国文

写完博士论文后,我曾写了一点感触,大意是:苦难多舛的现代中国,有了鲁迅也可感到幸福。当时我以鲁迅为题做论文,在那段纯真的读书写作岁月里深感幸福。

在我眼里鲁迅代表一种精神力量,他作品的魅力正来自于此。无论经历多少艰难挫折,他依然顽强不屈,奋力抵抗世俗。一般人看到鲁迅是个世故老人,忽略了这世故老辣的形象里还藏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既阴郁深沉,也幽默轻松,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年代有这么英雄般高大又凡人般亲切的人物,怎能不让人喜爱呢?在黑暗绝望的年代鲁迅的存在怎能不让人看到一丝微光呢?

我诞生在冷战年代的台湾,在冷战结束、两岸开放交流的1990年代念大学,在世纪之交开始翻阅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从而逐渐成为爱好、钻研此道的研究生,从课本的想象走上感性认识中国之路,最后辗转认识了鲁迅。

我想到鲁迅和台湾的文化渊源,鲁迅作品多次被引介到台湾均带有积极的抵抗精神。从1920年代中期以降,被尊称为“台湾鲁迅”的赖和一面从事启蒙民众的运动,一面从事抗日的文化运动。日本帝国战败投降后,鲁迅在台湾成为提倡民主运动,鼓吹反战争取和平的精神向导。鲁迅曾经是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但1950年代败逃来台的国民党大力整肃“赤祸流亡”后,很快鲁迅也成了“匪徒党羽”,鲁迅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并被抹消殆尽。直到1980年代末戒严令解除之后,鲁迅及老舍、巴金、茅盾等许多20世纪30年代作家作品才获得解禁,逐渐进入高等院校课程。

我初次在课堂上遇见鲁迅,已经是大三、大四之时,大约是1990年代后期。记得那时是一位来自香港某大学的郑姓客座教授,

他在课上谈《祝福》,谈五四的妇女解放运动,分析受礼教压迫的祥林嫂,但我那时根本不知鲁迅是何方神圣,只记得那被狼叼走的可怜的阿毛。

目前台湾学术界笼罩在上述的政治气氛底下,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初步形成,但远远未成气候,我个人的鲁迅研究以及教学工作着重对台湾学生的引介。我现在所做的如同当年那位香港来的客座教授一样,但我希望学生们不要只记得可怜的阿毛,我希望他们理解鲁迅、喜爱鲁迅,有一点抵抗世俗的勇气。有这点历史文化基础,我期许他们不要自我局限在台湾岛上,要勇敢渡海到中国大陆这广阔的天地去看看、去闯荡。不光是看看上海外滩繁华绚烂的夜景,还要看看街上过往的行人,更不要忘了在城市的角落、在底层为生存挣扎的人们。

在整个台湾社会陷入惶惑失落、茫然无主的困境之际,期许他们立足中国、胸怀世界,如此我方可说不虚混吃鲁迅饭的行列。

(作者为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所助理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

系1917年北大理科(非化学系,因当时还无化学系)毕业;许诗荀,系1922年北京工业专校应用化学科毕业。生卒年的补正有诗人石民为1904—1941;化工博士刘树杞,为1890—1935;女作家苏梅,后改为雪林行,为1897—1999;章衣萍夫人吴曙天为1903—1942;诗人汪铭竹,为1905—1988;台湾学生张秀哲,系1905—1982;鲁迅教育部同事张春霆,系1876—1956;哲学家张真如,系1887—1969;考古学家陈万里,系1892—1969;学者陈安仁,系1890—1964;林太乙,林语堂次女,系1926—2003;林如斯,林语堂长女,系1923—1971;林疑今,林语堂侄儿,系1913—1992;政治家罗衡(女),系1905—1984;世界语学者,巴金好友索非,系1899—1988;左联作家段雪笙,系1901—1946等。

至于姓名与字号倒错者,最明显的系,李季谷,原名宗武,字季谷,后以字行;李霞卿,季谷令兄,原名宗裕,字仲侃,号霞卿,后以字行;何思敬,原单名畏,字思敬,后以字行;胡兰成,原名积森,字蕊生,后以笔名兰成行;胡仲持,原名学志,字仲持,后以字行;胡愈之,仲持之兄,原名学愚,字愈之,后以字行;钱公侠,原名振海,字公侠,后以字行等等。

此外,有150人以上,均是学历的补正,尤为北大学生最多。其中我特别提出生平莫忘如深的香港诗人(原籍广东兴宁)柳木下(即刘慕霞)为例。笔者问遍了所有香港主要文学史料家或其好友,对其原名及学历均不得其详。仅由“人物注释”中得知,其系1916年生,广东人,上海复旦大学学生(1935年12月时),笔者由所藏1934年夏编印的《复旦大学同学录》,查明其学名为刘汉雄,籍贯广东兴宁,1932年考入复旦大学政治系;1934年时,年龄21岁,推算应生于1913年。这是我最大的发现,也感到莫大的高兴。

(作者为台湾知名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

鲁迅在台九十年

□徐纪阳

志》,成为集结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主要阵地。尽管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上的鲁迅评价无法对抗主流的“反鲁迅论”,但在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影响下,台湾旅美学者林毓生、李欧梵、王德威等在海外进行鲁迅研究,形成颇具学术影响力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上的鲁迅论。不过,这一流脉未能跳出“冷战”思维的限制。比如,夏志清的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在1970年代之后的台湾流行,乃根源于其内隐的“冷战”结构与同样由“冷战”意识形态操控的台湾反共文化政策的内在契合。

鲁迅批判精神在“地下”阅读中进入台湾知识青年的思想世界。对鲁迅的查禁封锁了“文学的恶声”,但这种封锁也加深了鲁迅所象征的批判性意义。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和乡土文学论战中所展示出的批判性视野,显示了青年作家对“反共”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突围。在此背景下,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以及后来被围剿的乡土文学,一方面呈现出对卑微弱小者的关怀,另一方面又延续和深化了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固有主题。

四、“解严”以来(1987—2010):重新进入鲁迅的世界

到1980年代初,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鲁迅的讨论,鲁迅作品亦在半公开状态中进行着大规模的流通。1989年,唐山、谷风和风云时代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三套《鲁迅全集》,引发了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成果在台出版的热潮。图书馆被封存的书籍开放给读者借阅,报刊杂志也以各种方式宣传鲁迅。呈现出鲁迅传播规模的扩大化和对鲁迅研究的多元化态势。紧接着,学术界开始对鲁迅进行学理性的研究,尽管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我们仍然期待台湾学术界能够以台湾独特的“鲁迅经验”为出发点,通过与东亚其他地区的鲁迅研究的对话而开辟一条全新的鲁迅研究路径。

然而,台湾在历经数十年对鲁迅的